

●张白影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

摘要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指图书馆争取或接受国内外机构、团体或个人捐款、捐书、赠物,以珍藏特色文献、充实馆藏、改善馆舍条件,增强为社会服务能力的行为和结果。图书馆要争取社会援助,应转变观念、拓展功能、完善自身形象。参考文献6。

关键词 图书馆 社会援助 图书馆经费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Public aids to libraries include money, books and other materials contributed to libraries by organizations, corporate bodies and individuals. Librarian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get public aids. 6 refs.

KEY WORDS Library. Public aids. Library budgets

CLASS NUMBER G250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指图书馆争取或接受国内外机构、团体或个人捐款、捐书、赠物,以珍藏特色文献,充实馆藏书刊,改善馆舍条件,增强为社会服务能力的行为和结果。图书馆作为向全社会服务的公益文化教育机构,几乎从萌芽时期起,社会援助就是其生命乳汁的一部分。西方国家早期不少图书馆,其雏型是团体或个人捐赠书籍的汇集;中国古代藏书,特别是书院藏书,社会援助乃为其主要书源;近现代中外图书馆历史上,接受个人捐书捐款而增充册府,建盖书城的雅事亦有许多。但这种本属顺理成章的社会善举,在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却没有蔚为风尚,也未形成图书馆行业 and 全社会的普遍共识,社会援助局限在少数名家名人和图书馆之间个例发生,多带“珍藏”“纪念”性质的文献归属、名望里程色彩;图书馆亦徜徉在被动接受、如承恩泽的情感状态之中;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对此极少涉及。究其原因,是计划经济及图书馆旧管理体制、图书馆从业者的思想观念等等所使然。作为文化事业重要一翼的图书馆事业,在思考如何从体制上深化改革,随着时代的进步创造新的辉煌时,研究图书馆的社会援助,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1 中外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社会援助从来就是图书馆生命乳汁的一部分

在美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曾有一页私人捐赠而光耀史册的浓墨重彩。1个多世纪前,钢铁大王卡内基(1835~1919)先后向图书馆事业捐赠3.3亿美元,使美国新添了遍布各地乃至穷乡僻壤的1679座卡内基图书馆和106座受捐而建的大学图书馆。此举惠泽千万渴求知识的人们,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精神与文明的动

力。这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带动了许多企业和慈善机构向图书馆解囊相助,在不到半个世纪里铸成美国图书馆事业空前的辉煌,仅公共图书馆就从1876年的188座猛增到1923年的3873座,建馆数增加20倍。可以说,卡内基从捐建图书馆这一具体行为,到树立人们明智的社会文化理念,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面貌,他的善举在美国演化成了全社会关心图书馆的传统。美国1980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费23亿美元,其中个人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即有2.139亿美元,占总经费的9.3%。

即使称雄世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最初藏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该馆开设之初由托马斯·杰斐逊私人图书馆捐的,至今,国会图书馆将一个国会公众接受信息的系统命名为“托马斯”路径。现今国会图书馆的收入除依靠政府税收拨款外,还拥有—个私营部门组成的赞助集团,为购置图书提供资金。图书馆在其发展的重大项目上还依靠社会捐赠。被誉为创造了工商界奇迹、并且正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个人电脑革命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长期与图书馆打交道,他的公司曾慷慨地向一些公共图书馆捐资数百万美元,以帮助处于电子时代的社区居民检索信息。

在中国古代,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并称图书馆事业四大支柱。后两类藏书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援助。以书院藏书为例,其来源于五个方面:皇帝御赐、官府置备、书院自置(包括书院刊印)、社会捐助和建立图书基金。社会捐助是书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宋代学者叶适在《石洞书院记》记载“东阳郭君钦正作书院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干脆以私

藏图书为基础创办书院,实现其捐书兴学的理想。

近现代中国,多有社会贤达和饱学之士,将毕生藏书捐赠某一图书馆,以抒其文光永照的宿愿,表现出爱国的高尚情操。北京图书馆在历史上,曾获得傅增湘、周叔弢、梁启超、陈垣等捐赠数量宏富、版本珍贵的图书。著名作家、中央文化部前副部长郑振铎向北京图书馆捐赠的“西谛藏书”广为人知。1958年,郑振铎不幸逝于空难,遵照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死了,书都是国家的。”他的夫人、子女谢绝了出价五六十万的书店,将全部藏书共计17214部,94441册捐献北京图书馆。郭沫若在50年代把自己一些颇有价值的手稿和藏书捐给北京图书馆,其中包括《屈原》、《虎符》等剧本手稿和一套迄今为止个人藏书中版本最为齐全的《管子集校》。

一些热情的外国友人,也以赠书的方式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的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支持。德国友人克本(Baron Georg von Koeppen)、周仲铮(德籍华人,画家兼作家)夫妇向北京图书馆赠书即是生动的例证。克本夫妇向北京图书馆赠书始于70年代后期,1990~1994年间,平均每年赠书2000余册,除德文书外,还有少量英、法、俄、西班牙文书籍。十几年来赠书总数近2万册,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图书馆每年购进德文图书的1/2~2/3,其价值约合人民币180余万元。周仲铮还从1978年起,向她的母校南开大学图书馆赠送图书。至这位老人去世,南开大学图书馆共接受其赠书近8000种,约1万册,年均600册左右,为近年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个人赠书之冠。北京图书馆自1990年以来获得“大韩出版协会”、“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等协会团体捐赠朝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8000余册,约合人民币51.3万元。

2 实现图书馆的社会援助,固然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现阶段应特别强调从图书馆管理体制、全社会的图书馆观念、图书馆本身的功能形象等方面反思和推进

图书馆事业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在主要依赖国家投入的前提下,应该并完全可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图书馆从业者亦应突破以往完全由国家统包经营的思想藩篱,摆脱消极与清高心态,在不断完善社会服务的同时,主动宣传、积极促进,形成图书馆社会援助的普遍共识。

经费不足是当代图书馆事业谋求发展遇到的世界性问题。西方国家图书馆经费来源大体上分三块:政府拨款、社会资助、自筹资金。美国大学图书馆近年经费有24%来自社会捐赠和服务收入。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有数千万美元的充足年度经费,但却始终积极争取社会援

助,该馆在获得4个外国政府出版物的独家免费收藏、建立了日本中部大学日文图书报刊资料中心后,还以社会捐赠建立了800万美元的图书馆发展基金,成功地在北美及世界范围内传播图书馆的影响。1997年新落成的美国旧金山图书馆,耗资1.4亿美元,被称为“为21世纪准备的图书馆”,同样依赖其优秀的社会服务和良好读者关系,获得了卓有成效的社会筹款。旧金山有20%的华人,图书馆在新馆内为华裔提供一间专门阅览室,除丰富的中文书刊资料外,还有古董装饰、大型画册和电脑,图书馆由此获得华裔捐款120万美元。

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亦有相当充裕的购书经费,却也从未削弱征集和接受香港内外团体机构或个人捐助。据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统计:1980~1992年间,该馆自购图书234703册,获社会各界团体个人捐赠图书121883册,捐赠图书占所增藏书34.2%,也就是说,它每年有1/3的藏书来自捐赠。

上述数例多少说明,图书馆首先应将主动争取社会援助视作本职本责,主动、热情、积极进取,本身财力的厚薄不应成为要不要社会援助的原因。图书馆获得社会援助的过程,是不断密切与社会和读者关系的过程,是扩散图书馆对全社会知识与文化的滋润,从而充分实现图书馆价值的过程,是提高图书馆社会形象的过程。

广东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在争取社会援助的观念上,比内地省份更表现出开放性和先进性,它们以广东侨乡亲情与地利优势,给图书馆事业引进了巨大活力。五邑大学1987年建校之初即得到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先生捐赠书款100万港币。建校10年来,该校图书馆接受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和个人赠书约16.72万册,约占全部馆藏的47.7%,平均每年接受赠书1600多册,赠刊1000多份。1994年该馆又获得香港实业家林健忠先生捐赠书款6万港元。李嘉诚先生斥巨资兴办汕头大学及图书馆,霍英东先生捐建西江大学图书馆,曾宪梓先生捐建广州医学院图书馆,苏李秀英女士捐建佛山石湾图书馆等,人们已耳熟能详。中山大学图书馆1988~1994年7年间,接受赠书共28142册,约值人民币100万元。这些书主要来自国外的作者、团体、出版社和一些基金会。国外赠书已成为该馆馆藏的一个宝贵来源,以1993年为例,英文赠书入藏量占全馆英文书入藏量的32.5%,日文赠书入藏量占全馆日文书入藏量的94.8%,港澳台中文赠书量占全年该类书入藏量的50%。该馆日文图书几乎全靠岩波书店、花甲协会等一些机构团体捐赠所得。港澳台文献的系统收藏已逐渐形成该馆的藏书特色之一。

港澳同胞和爱国企业家对图书馆的捐赠热情从广东惠及全国各地。包玉刚先生80年代捐建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一时成为图书馆接受社会援助的范例。李嘉诚先生 90 年代捐建北京大学图书馆,让这座举世闻名的百年书城面貌一新。邵逸夫先生 1986~1995 年,捐资 1.61 亿港元修建(助建)23 幢大学图书馆,新馆舍总面积达 24.5 万平方米。被誉为“文化使者”的香港出版家石景宜先生,从 1983 年起累计向内地几百家图书馆(室)捐赠图书 160 多万册,约合 1.3 亿港元。他们的行为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典范效应。

美国华侨学者以他们爱祖国爱乡邦的热情向中国大陆图书馆事业施以援手。由美籍华人(多半是大学教授)组成的科技教育协会,1990 年 4 月至 1994 年 7 月,在中国内地 4 个省 7 个市县与当地政府共建了 7 个图书馆。

3 争取图书馆社会援助时,把握各自乡土亲情、人文学术等优势,选好争取援助的切入点十分重要

3.1 与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乡情乡谊血缘之亲,当是争取图书馆社会援助的纽带

祖籍广东的海外华侨、华人约 2000 万人,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 70%,分布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港澳同胞 600 多万人,祖籍也大多在广东。从历史到今天,广东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从来就有爱国爱乡、捐资兴学、助办公益事业的传统。1912~1931 年,美洲华侨曾三次向广东图书馆捐款;1922 年新会籍侨胞冯平山以巨资在新会建公共图书馆;1924 年侨乡开平旅美、加司徒氏乡亲捐建图书馆。华侨、华人,书同文,血脉亲,有对炎黄文化的认同,有共襄善举,留芳宗亲乡里的传统美德。而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文化教育、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捐助的热情受到伤害。改革开放以来,粤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热情重新焕发,广东地区图书馆的社会援助由此精彩纷呈。

此外,海峡两岸的交流,增进了台湾图书出版界对大陆同行的友谊与了解,1993 年 11 月台湾出版界在北京首次举办图书展览,展后将 2 万余册图书全部赠送北京大学图书馆。

3.2 科学无国界及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理念,应融进图书馆社会援助的行为准则

改革开放政策使图书馆界通过更宽阔的渠道,获得国外友好团体和个人的捐助成为可能。国外一些大学、出版商、民间教育基金会,出于文化交流和国际友好的愿望主动表示向我国高校赠送书刊。国家教委自 1986

年以来,先后设立青岛海洋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上海同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4 个国际赠书转运站。其中,仅上海外国语大学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的“赠书分配转运中心”,统计至 1995 年底止,已接受赠书 6 万种,约 86.7 万册;赠刊 2100 种,19.6 万册,全国赠书受益学校达 670 所。一些城市还以国际间友好城市、姊妹城市的关系,以互惠互利的多种形式获得文化交流与图书馆间的支持援助。福建省与美国俄勒冈州建立友好州省后,1995 年俄勒冈州向福建省图书馆赠书约 1 万册。广州图书馆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签定了供借图书合同,接受了美国洛杉矶—广州友好协会 4 次赠书 4 万册。

3.3 图书馆应充分重视地方名人智力与形象资源,将此纳入图书馆社会援助

地方名人因其特殊社会地位,通常能给图书馆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其著作或藏书有的成为对图书馆的捐赠与赞助。著名作家玛拉沁夫曾向家乡捐赠 5600 余册图书,北票市图书馆辟出“玛拉沁夫书房”予以专藏,起到了发挥社会力量兴办图书馆事业的良好导向与示范作用。著名湘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将著作和主要手稿赠送湖南图书馆“湖南名人文库”后,又于 1994 年 3 月将 5500 册藏书全部捐赠该馆,赠书中包括线装书 3400 册,新旧平装书 2000 余册,线装书中不乏珍稀版本,该馆也辟专室展示。湖南大学发挥“千年学府”在海内外湘籍人士中的认同优势,于 1989 年在图书馆建“海内外湘籍名人作品收藏中心”,现已获赠各类著作 2 万多种、字画竹雕作品 1000 多件,成为该校乡邦文化研究的丰富文库。

江苏不少县市图书馆广泛收集本地区在全国及海外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线索,建立本地区人才信息网。如全国著名的教授之乡宜兴市和全国两院院士最多的常熟市,图书馆重点征集教授和院士有关信息和著作。不少市县政府借助图书馆的信息,加强了与知名人士的联系,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图书馆在自身获得社会援助的同时,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了有益中介,进一步体现了图书馆的功能价值。

3.4 把握地理、历史、学科优势,也是一些图书馆争取社会援助的成功经验

有的图书馆把握住一些名人曾在当地进行过革命或学术活动,或对当地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或与山水人文的深厚情结,开展了有效的征集活动。上海曾是近现代史上文化名人荟萃之地,图书馆每年四处采访征集,迄今已收集了 4 万多件名人手札、条幅、签名本、照片等,其中包括茅盾、郭沫若、冰心、蔡元培、曹禺、老舍、

陶行知等文化巨匠的手稿,珍贵文献蔚为芬芳,该馆由此建立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1周年之际,曾经举办备受各界赞赏的名人捐赠书画展。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杰出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曾在湖北洪湖市工作和生活过,洪湖市人民十分珍惜与路易·艾黎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深厚感情,该市图书馆1987年8月25日建立了“路易·艾黎文献陈列室”,并从中获得启示,创建“当代天下名人作品专藏馆”,在此后6年时间里,征集了1万余册(件)文献,为15个国家和地区540多位领导人或专家学者在馆内设立了珍藏文献的专柜或专室。洪湖市在地域人文上并无创办“天下名人馆”的明显优势,但选准了切入点,其图书馆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支持和援助,办出了特色。专业图书馆则发挥学科文献与信息集中之长,亦从本学科专家中获得支持帮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图书馆注重收藏与该专业有关的抽印本,曾接受私人馈赠达9850册,极大丰富了馆藏。著名古生物学家杨仲健、裴文中、周明镇逝世后,均将其藏书(主要是抽印本)捐献给该所图书馆。英国古鱼类学家罗杰·麦尔斯及德国古哺乳类学家屈内,在退休之后也将其藏书(主要是抽印本)捐献给该馆。

3.5 校友著作的征集,是许多大学图书馆充实馆藏的传统方式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图书馆均建有本校校友著作专藏文库。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建立的“南开文库”,数十载搜集本校毕业的国内外名人、校友著作,成绩卓著,校友们看到自己的著作收藏甚好并被广泛利用而欣然快慰。湖南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校友文库,以“藏之名山,流芳永远”为宗旨,吸引了历届校友将自己的作品捐赠。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还在征集校友作品的基础上,出版了“广西师大师友著作目录”,以此回报校友捐赠作品的情谊。

图书馆争取社会援助的方式,当然不止上述几种。但不论何种方式,均要注意选好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做到立项有理,援助有情,出师有效。少儿图书馆事业以其培育少年儿童的专业特点,更能获得社会援助,广州少儿图书馆舍系胡文虎先生亲属捐赠,天津君安公司一次向天津少儿图书馆捐赠100万元,这些例证都说明图书馆社会援助工作的切入点十分重要。

4 政府在图书馆社会援助中的指导、保障、扶植和促进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作为政府投资之外的一种主要支持形式,许多国家都以法律条文和章程制度明确表示

倡导和鼓励。《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第14条“国家对图书馆事业的政策”规定:“国家对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为使图书馆所收集与提供的情报和文化财富得到普遍利用创造条件……国家通过拨款和实行相应的税务政策、信贷政策以及价格政策来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第25条“图书馆发展基金会”则明确:“为了加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图书馆物质保障,可以建立国立和非国立的图书馆发展基金会。基金会资金来源可以包括:基金会创办者交纳的款项,企业、机关、团体赞助,公民的捐赠、抽奖、拍卖以及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收入。基金会收入列入图书馆事业发展计划,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协作和协调,以及按基金会章程用于发展其他图书馆活动,发展任何所有制形式的图书馆”。日本、美国也有类似的鼓励社会支助图书馆事业的法律条款。英国政府鼓励图书馆到社会上寻求支助。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29条“欢迎社会各界、国内外个人或团体对高等学校图书馆提供捐赠和资助”。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说:“图书馆经费紧张的状况一时难以根本改变,鼓励和吸引社会各界向图书馆赠书日显重要。”广东江门市图书馆在市政府号召和支持下,1995年获社会各界捐赠书款28万元。

政府对图书馆社会援助的支持,除了制定有关政策与法规,包括由政府进行调控的诸如税收、信贷政策、激励与引导个人团体向图书馆捐助外,还可以在组织社会活动,强化全民图书馆意识等方面给予引导支持。美国从1955年起,每年3月16~22日举办全国性的图书馆周活动,宣传“读书使你进步”的主题口号;日本议会1950年4月30日通过《公共图书馆专门法》后,每年的这一天被定为“图书馆员节”;日本各地都举行庆祝活动,充分肯定图书馆员的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组织的以“读书·图书馆”为主题的“知识工程”计划,对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了显著作用。广西计划用7年(1994~2000)时间,在全区形成读书、爱书、利用图书馆的良好风尚,完善图书馆的布点建设。政府各部门相互配合,加强宣传舆论,强化公民图书馆意识,发动社会向图书馆捐书捐款捐物,鼓励企业与基层图书馆建立“一帮一”“二帮一”的关系。这项活动使全区公民图书馆意识大为增强,1994年全区就建成100个乡镇图书馆。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九部委也曾颁发《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以政府号召和文件形式,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形成以倡导读书、传播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的一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湖南省文化厅从1985年起,把每年的3月24日定为湖南省图书馆界宣传活动日,开创了我国当代图书馆界走向社会开展大规模公共关系

宣传活动的先例。中央文化部于1989年5月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佛山市政府还曾在1990年首次决定将该年定为佛山市“图书馆年”。这些举措都是对图书馆社会援助的支持

5 归根到底,图书馆自身形象的完善、功能的发挥,价值的体现,才是争取图书馆的社会援助的根本保证

援助固然是社会为建设良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该承担的道义和责任,也是图书馆与社会形成和谐互助关系的一种润滑剂,但图书馆发展的根本之道,或者说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的根本之道,在于自身形象的完善和功能价值体现。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召唤,文化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以及人们文化消费多元化和价值观、审美观的变化,图书馆除了以传统方式经营和服务外,毫无疑问,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拓展服务功能,否则,必然陷在图书馆事业“低谷”的泥坑中,终日抱残守缺,怨天尤人。

美国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在70年代成立了一个名为“就业信息中心”(Job Infomation Center, 简JIC)的小型资料室。JIC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特殊服务部门,就是帮助失业读者找工作。据统计:1994年读者使用JIC为2830人次,1995年激增至7655人次,增幅为270%;1996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每年7000~8000人的使用者(不包括借阅JIC图书资料者)。读者对JIC的评语是“极为有用”,“从未想到图书馆会帮我找到工作”,“JIC是我的家”。1998年1月28日纽约地方报纸*New S-day*以“每天的就业市场——JIC帮助人们走上就业之路”为题,整版篇幅介绍JIC。美国图书馆积极拓展其功能,加重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价值分量。美国图书馆协会拥有颁发8项图书馆学奖和书业奖的权力,包括图书馆学教研奖、盲人服务奖等,有的对图书馆从业人员,有的对全社会。如纽伯里奖,这是以出版儿童图书的出版商约翰·纽伯里命名的奖金,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儿童服务部执行,自1922年第一次颁发,以后每年一次,颁发给美国有杰出贡献的儿童读物作家。通过这类活动,图书馆将出版商、作者、读者、政府和市民的热情汇集在图书馆。图书馆开展的这些项目,以传统的目光审视,也许列入异端,但这正是图书馆在当代社会中的激流勇进。对社会的渗透和服务愈深,与社会的联系与结合愈紧,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也愈大。

近年,在一些图书馆被描绘成“门庭冷落车马稀”、“门可罗雀”时,深圳与上海的图书馆却读者热,人气旺。报载“上海黄浦区图书馆1992年流通图书78.6万册

次,到馆读者35.5万人次,创历史最高记录。他们打破了在区内发证的限制,把老年人和红领巾引入读者群,把服务触角伸向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把读书活动办到远洋轮上,极大地扩充了图书馆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尤其具有特色的是,他们倡导一种大文化的服务思想,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解放日报、上海广播电台、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晚报等均载文予以肯定。”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举办各种展览会、报告会、讲座、专业培训班、大型社会咨询等活动;又与广州日报社、广州市新华书店联合举办“粤版书评征文”系列活动,为伤残人提供热情周到服务,向监狱犯人赠书,在广州发起向贫困地区图书馆赠图书活动等,极大提高了中山图书馆的知名度。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专门设立了公共关系部。1989年湖南图书馆以团体会员身份率先加入湖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图书馆公共关系的作用在于争取和增进内部及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为自身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是内求团结完善、外求和谐发展的管理艺术。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图书馆的兴衰存亡越来越有赖于在读者市场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重视塑造包括读者服务、公关宣传、承办大众文化事业、图书馆的外部观瞻在内的图书馆形象,已成为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图书馆的一种可以带来价值和财富的无形资产。

综上所述,不论树立图书馆社会援助的观念,或争取社会援助的实践,都应对当代图书馆的经营管理有良多启示。图书馆事业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寻求自身进步时,理当顺时而变,深化改革,转变观念,获得更多源头活水而开拓图强。

参考文献

- 1 刘光宏 文献捐赠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图书情报工作,1997(8):39
- 2 李悦,王雪凤 我国高校接受国际赠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大学图书馆学报,1995(1):54~55
- 3 邱峰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文化书使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21(1):3
- 4 林曦译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 江苏图书馆学报,1997,23(1):51~56
- 5 广东图书馆学会 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与广东图书馆事业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张白影 广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员。
通讯地址:广州市。邮编510400。

(来稿时间:1999-06-01。编发者:刘喜申)